在走访了国内20多所高职院校后，我看到了不同于国内普通本科院校的别样风景

黄达人：我们向高职院校学什么

人物说话

黄达人

本报记者 谢 洋 林 洁

“这些校长都非常执著，他们对教育制度、各种政策的把握和理解甚至超过普通大学的办学者，所以我经常对从事职业教育的管理人员和老师说，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在走访了国内20多所国家级高职示范校、骨干校、民办高职院校的校长书记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掌门人后，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对我国高职院校的现状和办学者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和理解。

去年7月，黄达人将他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写成《高职的前程》一书付梓出版，但他对高职教育的关注并没有随着这本书的面世画上句号。就在今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中山大学对他进行采访时，他前一天刚赴湖北参加了一个职业教育的校长会。此前，教育部召开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2~2020）”专家论证会，他是专家组两位组长之一，为高职教育发展献计献策。

高职教育究竟有何魅力，吸引着黄达人教授持续地关注这一领域？在可见的未来，高职教育要如何发展才能拥有一片更广阔的空间？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高职院校真是百花齐放

国家需要这样的学校

在中山大学担任校长时，黄达人就在媒体上表达过一个观点：每个大学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前不久，他跟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交流时，程星谈起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别：我国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大都按分数取校，最高分肯定是上北大清华，接着是“985”、“211”院校，然后按分数往下排，很少有学生考虑个人的兴趣、性格和个人特点跟学校的风格是否匹配，但美国学生考虑得更多的是哪个学校的文化更适合自己，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挥。“这说明我们的大学从特点上比较雷同，至少可以说没有国外的大学那么特点鲜明。”

但走访了国内20多所高职院校后，黄达人看到了不同于国内普通本科院校的别样风景。“真是百花齐放”——他这样形容访问过的那些特色鲜明、区域性特征明显的高职院校。

在黄教授访问的20多所高职院校中，有相当多的学校是办在高新区、开发区里。他曾经考察过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那是一所在新加坡产业园里开办的学校，完全按照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模式来运作，学院跟企业的关系非常好、创新的意识特别强，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特点也非常鲜明。他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时发现，因为温州小微企业比较发达，学校的研究所大都为它们服务，研究所由企业来建，但里面一定要有老师、学生的岗位，院校把建立研究所跟培养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把育人放到科研的过程里。

在访问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时，对方没有安排黄达人去参观学校，而是让第二重型机械集团的总工带他参观二重，一边参观，总工一边给他讲哪些东西是企业跟学校一起做成的。“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普通大学，怎么会让你不先看学校去看企业呢？”黄达人赞叹地说，像这样的学校在高职领域有很多。高职院校为了适应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把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统统改掉了，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学校。

高职校长思考的很多事我以前没想过

高职院校更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

对国内高职院校的校领导进行访问之前，黄达人曾经对国内24所985高校的校长、书记进行了访谈，并将其办学思想汇集成《大学的声音》一书出版。黄教授认为，他访问过的两类不同高等院校的校领导都非常关注学生的成长。但高职校长在谈教育时，更多的是在谈自己的感受，很实在，“我感觉跟他们很容易做朋友，他会把心掏给你。”黄达人说,曾有两位高职院校校长跟他谈起当年办学的艰辛，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在培养学生方面，黄教授认为高职院校的校长更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由于高职学生大都是高考体制下的失败者，在他们入学后，学校总是用励志教育等各种办法去消除学生的失败者心理。对于就业工作，很多高职院校领导关注的不仅是学生的就业率，还更多考虑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因此，他们在课程安排上也是煞费苦心，既要让学生得到技能培训，也要让他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使他们的职业生涯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正是因为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差异性，使黄达人深深感到，访问这些高职院校办学者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高职校长的很多思想，不断地在丰富他的一些感受，很多事情他以前没想过的，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启示。

在大学里，究竟该对大学生实行补短教育还是扬长教育，就是黄达人跟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赵居礼交流时，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在很多高校，有的学生英语不好，可能他大学这几年都在补英语，有的人数学不好就拼命补数学，补得灰头土脸，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补短教育。而在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注意将补短教育转化为扬长教育，让学生强的地方更强，掌握专长的学生同样也可以很好地服务社会。

黄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高等教育能不能有更多的模块供学生选择，学生既可以从这个模块毕业，也可以从另一个模块毕业。不同模块的差异性比较大，学生可以选择能发扬他长处的模块，找到适合自己的毕业通道。“教育不像做工业要遵循木桶原理，只要学生擅长的方面特别强，他就不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从高职院校的访问中悟出来的，而且是可操作的一件事，值得我们所有从事教育的人思考和重视。”黄达人说。

政府重不重视职业教育是个“双头问题”

大学对社会应该首先讲贡献和主动适应

在《高职的前程》一书序言中，黄达人对高职教育未来的发展提过两个重要建议：一是落实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根据“谁举办，谁出钱”的原则，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使高职院校在“十二五”期间的生均财政拨款与当地本科院校相一致；另一个是为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寻找一个突破口，从而使职业教育在社会上更具吸引力。

尽管高职教育发展有很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但近年来黄达人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转变：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还不平衡，但各地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从整体而言在往好的方向走。前不久，他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访问，院长去火车站接站时刚开完省里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省领导有好长一段话在讲职业教育。黄教授觉得政府把技能人才的培养放到经济工作会议上讨论，是非常可喜的。

有些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能很好地解决职教发展资金投入，黄达人认为这里既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领导认识不足的问题，也有一些高职院校办学不能主动适应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一个“双头问题”。

黄达人曾经去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调研，这所学校在空客A320、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等一批航空航天龙头项目落户滨海新区后，马上开设了飞机制造技术、航空电子设备维修、机电一体化等航空航天类专业，并在滨海新区设立联络点，经常了解开发区有什么需求，跟着地方的产业需求去办学。他认为，这就是办得好的高职，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这样，也有一部分学校不能主动适应变化，而是愿意开设那些办学成本低、师资要求比较低的专业。

“虽然公办高职院校都是由地方投资举办，但学校开设什么专业，具体怎么办学却并不是政府直接指挥的。我认为，大学对社会应该首先讲贡献，讲主动适应。”黄达人说。

只有把自己做强才会让别人重视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不可取代

黄达人教授的这本书之所以取名“高职的前程”，实际上包含着他对职业教育未来的一种展望：一方面希望职业教育的体系能尽快建立起来，不再是断头路，学生就会觉得有希望。更重要的是职业院校要抓住机遇，加强自身建设，只有把自己做强，才会让别人重视你。

黄达人认为，高职院校既然是高等院校的一种类型，那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应该是一致的。黄达人对高职院校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重视大学文化建设。黄达人认为大学里的文化是培养人最重要的方式，现在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学生需要的所有知识差不多在网上都能得到，那为什么还要来大学读书？因为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并不仅限于课堂，国外有校长甚至认为，对学生的培养只有10%是在课堂内完成，另外90%是在课堂外、学校内完成的，所以，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不可取代。在黄教授看来，大学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行政文化，这是决定整个大学氛围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一所学校的行政文化决定了学术文化，因此首先要把良好的行政文化建立起来。

二是要重视学校的内涵建设。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内涵建设主要讲的就是专业建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是课程体系建设。课程看起来很微观，但它是我们提供给学生学习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单元。不同学校虽然有不同的定位，但重视课程建设的道理是一样的。

三是职业教育也要重视科研。黄达人曾经听到一种观点，有人觉得高校太重视科研容易把教育教学给丢了，但他认为如果一所学校把科研作为培养学生的手段和过程，那这个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衡量一所高校科研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其是把科研当做育人的一个环节，还是纯粹地去搞科研。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育人的环节，那所有的学校都应该重视科研。

四是要重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黄达人在观察职业教育时，觉得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双师型”。有的高职院校趁企业经济不景气时，从企业挖人过来做老师，以解决“双师型”师资缺乏的问题。但黄教授认为，现阶段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应该更多地把老师派出去，有计划地送到企业去。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跟企业的人员有了感情，有了共同语言，对企业的情况更了解，不仅能参与到企业的科研里去，而且还能为学生的实习、就业打通渠道。

志愿者精神跟大学终极追求的精神一致

高校应该重视学生志愿者精神的培养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时，学院院长刘洪一提出要把深职院建成“志愿者之校”的理念，给黄达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011年夏天，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举办，深职院共有9000多名学生及教师参与到大运会志愿者队伍中。校长刘洪一表示，学校把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当成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志愿者工作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相结合，并通过推进志愿服务进入课堂、建设志愿服务基地等措施，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升华志愿服务理念，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

有着同样想法的高职院校并非深职院一家。2012年12月5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也率先在浙江推出“志愿者之校”建设目标。学院出台把志愿服务纳入评奖评优、学生志愿服务时间达30个小时可获1个学分等多项激励机制，引导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提升自豪感和自我认可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在黄达人看来，志愿者精神跟大学终极追求的精神是比较一致的，他很欣赏学校用志愿者精神来教育学生。前段时间，他在访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时，向李百炼副校长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中国内地到美国留学的人那么多，但在美国高校中担任校领导的却很少？李百炼认为，其实我们的学者做学问比别人一点都不差，但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愿望就没有那么强了。参与公共事务是没有报酬的，相当于一种志愿服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展现个人才华，让别人了解你的过程。如果你不参加这些活动，人家对你的才能和为人了解得就没那么深刻，所以往往选拔时就不会找你，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达人认为，志愿服务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普通本科院校，都应该重视学生志愿者精神的培养，这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和长远发展都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毕业生专场 争奇斗艳

1月16日晚，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人物形象设计专业与服装模特表演专业2013届毕业专场发布会。32名毕业生展示了科技复古、自然幻彩等5个系列42个形象设计作品，色彩与时尚共舞，完美诠释最新妆容潮流。

王国海摄

职教信息化建设要坚持应用为先

多媒体不等于“倒霉体” PPT不是“骗骗他”

本报记者 李剑平

“能用语言表述的不用板书，能用板书表达的不用PPT。不能一提信息化建设，就把传统优秀的教学手段束之高阁。”前不久，在江苏南京举行的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清华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教授程建钢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教师的广泛关注。

在609件信息化教学作品，1146名教师同台竞技的这场职教信息化“盛宴”中，程建钢教授为自己的大赛总点评而犯难：做PPT与信息化潮流相吻合，不做PPT怕自己被“OUT”。最后，他用做PPT的时间与精力来思考自己的点评，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握在手中娓娓道来。

程教授说，他只想通过这个举措来传递一种态度与导向，即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要以中学与普通大学信息化的一些“败笔”为鉴：“数字校园建设被企业‘绑架’，老师被设备与软件‘绑架’，多媒体就是‘倒霉体’，PPT就是‘骗骗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代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对此次大赛点评说，有的参赛作品以PPT为主，针对教育教学的少；有的参赛作品覆盖专业面不广；老师按真实项目与生产实际研发的实训软件少，自主创新的少；个别老师不注重版权保护，把出版社的个别信息化课件作为自己参赛的核心部件等。

对于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刘延申教授建议说，一是要作好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规范；二是要促进信息化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是要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国内、国外比较研究，借鉴和学习高等学校、中小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四是要加大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力度，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研究；五是要实现传统优秀教学手段与数字化教学手段有机统一发展。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上说：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基础还比较薄弱，发展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到位。不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存在“重建设轻应用”、“重硬件轻资源”的倾向。

同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差距，农村职业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薄弱，农村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有待提高；与课程教学融合配套的优质实用教学资源不足，原创及创新性资源较少，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资源有待深度开发。

尤其是在有些地方，对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缺乏统筹，信息孤岛与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普遍，系统间互联互通性较差，资源开放性、共享性不强，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等等。

“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任务非常紧迫。”鲁昕特别强调，各地要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导向，坚持硬件、软件“两手”都硬，以应用驱动为主，有区别、分步骤推进实施，避免搞“一刀切”与形象工程。

网络时代，何必非要把学生拉回课堂

灼见台

王寿斌

若尘的文章《网络时代，拿什么将大学生拉回课堂》，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普遍而严峻的大学生活怪象，手机的普及、网络的加速，在为学生提供信息检索便利的同时，也无情地“绑架”和“奴役”了一代青年，成为大学生健康、快速成长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作者据此慨叹大学生逃课成风、混课蔓延，甚至出现师生一起混日子而心照不宣的现象，担心长此以往必将不可救药，并进而呼吁教师要提高课堂吸引力，努力将学生拉回课堂。（详见2012年1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毫无疑问，从表象上看，若尘文章的论据和立论都很合乎逻辑。学生的天职是学习，而不能沉迷于网络和手机；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向学生传道授业；学校的功能则是教与学的媒介和场所。所以，学生出现逃课、混课现象，教师当然有职责想方设法让其回归“课堂”。

然而，如果我们细加琢磨，就难免会生出些许疑惑：在“填鸭式”教育早已广受诟病的教育大环境下，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学生拉回“课堂”？更何况是网络时代！

显然，执意要把学生拉回“课堂”的教师，在彰显其工作责任心和职业操守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其育人理念的滞后和信息化意识的落伍。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教育工作者一直苦心孤诣地坚守“课堂”阵地，坚持认为学生只有坐进“课堂”才能学到东西，只有认真听老师讲课，记好笔记，考得高分，才算成绩好、收获大，即便是学生到了大学时代，也总舍不得轻易放手。这一优良的教育传统确实曾经培养了大批青年学生务实、严谨的学风，夯实了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积蓄了他们的发展后劲。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快速到来，这一做法的弊端正越来越显现出来，甚至成为现代学生健康成长、创新发展的桎梏。

首先，在网络时代，知识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以“填鸭式”的灌输为主，最擅长于解析和灌输“知识点”的教师往往被视为优秀教师。在这种育人模式下，师生眼中的知识存在形式普遍是零散排列的“知识点”，而不是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更不是综合性的应用能力，这是我们的学生为什么普遍眼高手低、会说会考却不能做的重要原因。如今，在用人单位的多年“倒逼”之下，学校，尤其是职业院校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工程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这样的能力，远非学生静坐“课堂”可以获得，更非教师照本宣科可以“传授”。

其次，网络时代，知识的载体也已发生了改变。中国古语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甚至以“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知识渊博。显然，书是知识的载体。然而，步入网络时代，当知识逐渐被能力取代以后，人类不再单纯以熟记“知识点”为学习目的，而以培养各种生存技能和职业能力为终极目标，因而知识的载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各种基于技能培养的知识，不仅存在于传统的书本中和课堂里，更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团队合作、工程项目之中。要想获得这类“知识”，培养这些能力，单纯的课堂教学断然于事无补。而且，数以万计的精品课程、视频课程、多媒体课件、学科素材的网络存在，国际化课程资源的无界化共享，更以崭新的知识载体为青年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便利。

第三，网络时代，知识的传输与获取方式发生了改变。“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凡为人师者，无不熟悉这一自励名句。传统的知识传授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单向的“灌输”，老师讲，学生记，从而实现知识的衰减性传递。步入网络时代，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单凭教师课堂所教，远不能实现海量知识与复杂信息的快捷传输，更不能满足学生的终身职业需求。因而，自主学习、做中学、项目导向学习成为大势所趋，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分工产生改变，学生不再是被动灌输者，而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则变成教学的组织者与协调者，教师的重要职责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引导学生学习什么，以及协调资源、创造条件让学生高效学习。而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也不再是课堂，而更依赖于网络资源和电子化学习工具。

由此看来，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已被颠覆，用人单位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能力本位逐步取代知识渊博，职业素养逐步取代学历门槛，因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更须适应变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多媒体在辅助和助推自主学习方面的优势，而不能简单地将学生封闭于沉闷的课堂，满足于了无生机的枯燥讲解和生硬灌输。

不难理解，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一味抱怨学生旷课、混课，抱怨学生沉迷于手机和网络之时，我们的学生或许也在抱怨教师照本宣科无趣、泛泛而讲枯燥、内容陈旧无用；当我们抱怨学生什么都不肯学，什么都不懂时，或许我们的学生也能提出许多连老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在课堂上搜索枯肠来苦心剖析一个概念、纠结于一个术语时，或许坐在台下的学生早就通过手机网络搜出了非常详尽的答案，了解了教师也许尚不知晓的知识关联；当我们恨铁不成钢地抱怨90后“不可教”时，或许他们正在心里不屑一顾地嘀咕60后、70后“不会教”！

手机无过，网络无罪。学生沉溺其间而不能自拔，教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学生的懒散消沉，更须反思的是人师。当现代的网络化环境、信息化社会与传统的教书育人产生矛盾冲突，我们更应科学引导、积极应对，同时不断改革育人方式，转变职业角色，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健康成长。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

倒闭危机正临近一些民办高职

本报记者 李 斌

近日，在温州召开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曹勇安受邀作主题报告。他说，一些民办高职院校生源大幅度下滑，倒闭的危机正一步步地临近，民办教育能否有效应对未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其管理者的认识和水平。

曹勇安认为，缺乏危机意识，忽视办学质量，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努力扩大办学规模，是当前各类民办院校的隐忧。他说，总结世界上百年老校的历史会发现，没有一所是靠学费运转的。民办学校在发展初期，没有规模不可能生存，但不能周而复始地“重复昨天的故事”。

曹院长认为，民办院校“地毯式的宣传，传销式的招生、粗放式的办学，盲流式的就业”，这条路已经很难持续，应该眼光向内，转变发展方式：由服务全国向服务地方转变，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才和教育支持为目标；由单纯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向多种形式教育并存（特别是各类培训）转变，满足地方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需要；由依靠学费办学向“以校带企、以企带校”转变。

曹勇安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办教育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弥补财政不足到满足多样化需求，从拾遗补缺到促进教育改革。他认为，与公办学校校长重在执行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政策不同，民办学校的校长的职责在“三化”：一是预测变化，看别人没有看到的事；二是客观规划，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事；三是重在异化，做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民办院校体制上的优势，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通过法人治理调动起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曹勇安说，“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民办教育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并不是每一所民办学校都能发展，更不是平均发展，只有潜心打造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据悉，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温州市教育局承办。会场打出了多条宣传标语，其中两条呼吁：把市场让给民办教育，把空间留给民办学校；给举办者信心，让教师安心，使家长放心。